

我國文化安全戰略的發展模式探討 — 建構主義的觀點

邱延正

實踐大學博雅學部兼任助理教授¹

摘 要

冷戰結束後的複雜國際情勢，使得國際關係安全研究的範圍和議題更為擴展，國際關係相關的安全研究架構已無法滿足研究所需。在過去，文化及認同因素被認為是解釋國際現象的「最後選擇」，但冷戰結束後對文化與認同的研究已經成為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課題，而主導國際關係的相關論述諸如「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等議題也較之以往更為關注。在國際安全研究的觀點和實際均產生重大變化的同時，台灣的安全環境的轉變亦隨之而起，新的安全議題也不斷的出現。本文嘗試透過國際關係「建構主義」中對於文化與認同因素的分析，一方面重新檢視國際關係安全研究的演變和趨勢；同時探究文化及認同因素對於台灣國家安全所產生的影響。

以溫特（Alexander Wendt）為代表的建構主義學派，強調國際政治體系的結構與「新現實主義」的結構不同，是一種社會意義上的結構，重視國際體系結構對體系單位的作用。溫特「建構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結構不僅對行為體的行為產生影響，同時也塑造了行為體的「身份」（identity）。而基於「共有觀念」所建構的「身份」同時也型塑了行為體的「利益」，針對此點，溫特提出奴隸主與奴隸之間的關係，唯有在一個奴隸制的社會結構中，透過與奴隸的互動關係，從而作出符合其身份的行動。上述的「共有觀念」形成三種無政府狀態文化，包括：「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與「康德文化」，這三種無政府狀態文化的主要特徵為：敵人、競爭者與朋友，並通過三種途徑來達到此目的：通過主權行為體的演變、行為體漸進式的合作及國際勢力轉變「利己的認同」為「集體的認同」。換言之，溫特以為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並非一成不變，端賴兩個行為體想要形成何種無政府文化關係，亦即兩國主觀上要建立何種「身份」的問題。

當我們從國際環境思考台灣安全時，美國與中共的互動已經無可迴避的存在於台灣戰略布局

¹本文曾於國防大學戰爭學院「國防安全與軍事戰略」研討會發表，2011年5月26日。

我國文化安全戰略的發展模式探討－建構主義的觀點

首要考量的決定性因素。而非傳統性安全威脅也對台灣產生重大的影響。兩岸關係就結構現實的觀點來看，其權力分配是極度不均等的，台灣與中共的不平衡之所以維持，是因為外部有美國作為平衡的關鍵角色，而台灣的穩定也幾乎取決於兩岸實力的消長。因此，未來台灣應有的安全戰略思考，即在於了解全球化下的安全環境變化，進行國家體質與政府結構的調整，發揮不對稱戰略的思維，擴大自身的優勢作為，克制敵方的弱點。並且增強台灣硬實力與軟實力的交互應用，影響力與吸引力的建構，強化台灣的正面民主化形象，促進世界輿論認識台灣，並調整國家安全戰略與政策，主動、積極、全方位的釐定因應的作為。

關鍵詞：國家安全、建構主義、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

邱延正

Discussion on Development Model of ROC Cultural Security Strate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vism

Yen-Jen Chiou

School of Liberal Education serves as Assistant Professor
SHIH CHIEN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the cold war, the complex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has expanded the scope and range of subject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ecurity study. The framework of security study associated with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s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researchers. In the past, culture and identity were considered the “last resort” to explain international phenomenon; however, they have become critical subjects when study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fter the cold war. And discourses domina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uch as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have received more attention than ever. While the perspectives and reality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y underwent dramatic changes, Taiwan’s security environment also witnessed a transformation and new security topics have kept appearing. Through the analyses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within Constructivism,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view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y as well as probes into the impacts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on Taiwan’s national security.

Constructivism advocates (most notably Alexander Wendt) underline that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 unlike Neorealism, has a social significance and emphasizes international system’s function on its actors. Wendt argued that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not only influences actor’s action but its “identity”. And the “identity”, based on “shared idea”, also shapes the interest of actors. Therefore, Wendt proposed master-slave relations: only in a slave society, through the interactions with slaves can one act in accordance with his identity. The abovementioned “shared idea” forms three cultures of anarchy: culture of Hobbes, culture of Locke and culture of Kant featuring enemies, rivals and friends. And they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change of sovereignty action, actors’ progressive collaboration and transforming “egoistic identity” to “collective identity”. In other words, Wendt believes anarchy is not invariable. It all depends on what kind of anarchy relations do two actors desire to form, or what kind of identity to establish.

When considering Taiwan' s security with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US and PRC is inevitably the decisive factor and the priority in Taiwan' s strategic deployment. Unconventional security threats have posed huge impact on Taiwan. From the constructive practical perspective, power is seen imbalanced in cross-strait relation. The reason the imbalance between Taiwan and PRC sustains is the exterior role played by the US and that Taiwan' s stability is nearly decided by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strength of both sides. Hence, Taiwan' s future security strategic mindset lies on the change of security environment under globalization so that the country can adjust national structure, exert asymmetrical mindset, expand self-strength and strike at enemy weakness. Meanwhile, Taiwan shall enhance the alternate application of its soft power and hard power, build up its influence and appeal, strengthen democratic image, advance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aiwan, revise national strategy and policy and formulate correspondent actions positively, vigorously and comprehensively.

Keywords: national security, Constructivism, the Culture of Hobbes, the Culture of Locke, the Culture of Kant

「國家安全」是一種動態的概念，會隨著時間的演進，客觀環境的轉變而擴大、豐富其內涵。傳統上，由於美、蘇集團的長期對峙，「國家安全」的核心議題主要圍繞在軍事力量與國防事務，其所關切者不外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冷戰結束後，由於受到國際環境的演變對於國家行為者追求安全能力的限制、安全情勢與議題變得日趨複雜、以及「預防」的概念逐漸取代「嚇阻」的傳統思維等新變數之影響，「國家安全」的內涵亦需要進一步的充實。在分析層次方面，從過去僅重視軍事安全、地緣政治安全延伸到對如經濟安全、社會環境等領域的注意；關懷議題亦由過去單純的「外在威脅」擴大至所有足以影響國家重大利益與核心價值之「內外威脅」來源。是此，冷戰結束後，由於內涵的深化與概念的擴大，當代的「國家安全」又可稱為「綜合安全」²。

冷戰結束後的複雜國際情勢，使得國際關係安全研究的範圍和議題更為擴展，當前國際關係相關的全研究架構已無法滿足研究所需。在過去，文化及認同因素被認為是解釋國際現象的「最後選擇」，但冷戰結束後文化與認同研究已經成為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課題，主導國際關係的相關論述諸如「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對這兩個議題也較之以往更為關注。雷善（Mark Latham）認為在國際關係相關論述中，文化與認同等社會學面向因素的探討是一項「強勁的知識開展動作」（Latham, 1996）。由此衍生的諸多觀點，如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反思主義（reflectivism）、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女性主義（feminism）等，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受到愈來愈多的重視。

而在國際安全研究的觀點和實際都產生重大變化的同時，台灣的安全環境亦隨之轉變，不僅中共的軍事威脅未曾稍解，而新的安全議題也不斷的出現，台灣的國家安全威脅仍然存在。本文嘗試透過國際關係建構主義對於文化與認同因素的分析，一方面重新檢視國際關係安全研究的演變和趨勢；同時探究文化及認同因素對於台灣國家安全所產生的影響。本文主要是探討下述三個議題：

1. 後冷戰時期的國際\國家安全已不同於冷戰時期，在理論及實際層面上都有顯著的變化，因此，在建構國家的文化安全戰略上，應更符合時代需求。
2. 台灣未來在國家安全的維護上，應重新思考如何整合理念因素和物質條件，審慎評估台灣真正的安全需求。
3. 建構主義的安全研究對於文化、認同、規範等理念因素的重視和討論，有助於台灣建立對於國家安全不同的思考向度。

² 1997年12月日本野春研究所(Yokohama Business Park)發表「國際環境的變化與日本的反應：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提言」，第一次提出「綜合安全」的概念。1980年代大平正芳(Ohira Masayoshi)內閣提出「綜合保障戰略」，其內涵已將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相結合。

壹、我國安全環境的轉變

就國際與區域環境因素而言，台灣安全環境在國際體系中無政府與權力平衡狀態下，體系結構的影響來自構成員—國家之間的「社會化」與「相互競爭」，體系成員如果不依靠成功者的模式，對小國影響最大，錯誤的行動與錯估形勢將造成致命的後果，對於台灣而言自不例外。從冷戰期間至今，影響我國安全環境轉變的幾個面向可歸納如后：

一、轉變中的國際安全環境

冷戰期間國際間呈現美、蘇兩極超強體系，冷戰後轉變中的國際體系，促使美國思考如何維護「一超多強」的世界領導地位。新世紀之初布希政府上台後，911 恐怖攻擊事件對美國本土造成前所未有的震撼，不僅牽動了傳統強權間的互動關係，美國因此調整了以反恐優先，強調「國土安全」的全球戰略。從「布希主義」的戰略來看，為確保本土「絕對安全」—單邊主義思維，跨越至「先發制人」—主動攻擊的戰略思維，並達到實現反恐全球戰略的軍事目的，特別在美伊戰後，已將國際體系塑造為名符其實「單極為主的多極體系」，目的在追求最大程度的美國國家利益（羅致政，2003：57-69）。但是單極為主，並不表示美國可以強勢推展單邊主義，反恐戰爭與北韓問題就是最佳例證，當體系內主要國家基於國家利益而有不同的盤算，美國仍需要雙邊、多邊甚至於聯合國的機制，謀求國際合作，方能有效展開反恐的戰略行動。

美國以超強之勢主導國際體系的運作，能否觀察國際環境具有持久性與穩定性，實無法預測。事實顯示，在國際體系變遷與美國全球戰略的調整下，對於亞太安全情勢、台海安全環境暨崛起的中共，都造成絕大的衝擊。對中共而言，中共已成為冷戰結束後取代蘇聯成為重要的一「極」（黃介正，1999），911 事件是一戰略機遇期，美國把中共視為「威脅平衡」的潛在對手。未來中美關係在美國全球戰略的結構中，取決於雙方的實力與利益，美中關係在國際體系運作中仍是既合作又競爭的局面。

二、911 後亞太區域安全環境

目前亞太地區在國際體系的演變中出現一個引人注目的特點，即在地區政治、安全秩序的取向上出現了三種相互之間具有競爭性的模式，這就是中俄倡導

的多極模式、美國極力推動的單極穩定模式、以及一些中小國家積極提倡的多邊合作模式。其中，美、中、日三角關係是決定亞太地區格局的關鍵，而東協在維持亞太安全的穩定亦具有影響力。特別是美國與地區實力日增的中、日兩個大國，在政經利益競逐的同時，也存在有較高的摩擦與衝突機率。

觀察 911 後美國所主導的反恐體系結構中，權力分配的思維由全球戰略佈局為先，次為戰略重心東移至亞太次區域，再以東北亞為亞太區域核心，再次為東南亞地區，為實現全球戰略目標，亞太地區具有舉足輕重的重要地位。美國將「美日安保」視為同盟保障，東協成為反恐第二戰線，因擔心中共的威脅而採取「攻防兼具的新嚇阻觀」(New concepts of deterrence that rely on both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forces) 下的「新戰略架構」(new strategic framework)³。但在反恐戰爭與北韓問題中又不得不依賴中共的調處，美國單邊主義—「先發制人」的全球戰略面臨考驗，從而構成亞太區域強權存在互相制衡又相互合作與衝突的特殊局面。因此，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安全戰略必須達到三個目標 (RAND Research Brief, 2001: 8)：1.防止區域霸權的興起；2.維持地區的繁榮與穩定；3.防止亞太地區民主轉型的失控。

對中共而言，中共靈活運用大國外交與以睦鄰政策為主的「新安全觀」以抗衡美國的亞太戰略。在和平與發展為優先的戰略思維中，追求周邊安全穩定的戰略環境。911 事件使中共不僅避過了布希政府原本對準中共的戰略壓力，爭取發展綜合國力的戰略空間，當前的亞太區域形勢對中共亦是機遇大於挑戰。相對於身處亞太形勢中的台灣而言，美中台三邊關係對台灣安全具有決定性影響，對區域安全形勢存在潛在危機，須以微觀角度檢視美中台三邊關係走向。

三、當前台海區域安全環境

當我們從國際環境思考台灣安全時，國際體系影響下美中戰略互動，才是影響台灣安全的重要結構性因素。然而從亞太格局思考台灣的安全時，發現美、中、日「亞太三角」與東協關係的格局中，由一個非亞太國家美國與中共的競逐，才是攸關台灣安全的直接因素。換言之，從美中台「兩岸三邊」架構思考台灣安全時，美國與中共的互動才是兩岸發展的關鍵性因素。觀察台灣的安全環境，須就東北亞主要國家、美國與東協等對台灣安全的影響分別論述之：

³ 「攻防兼具的新嚇阻觀」下的新戰略架構，乃小布希於2001年5月1日之一演講中所提出的。此演講稿請見：“US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speech at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on missile defense,” 美國白宮，新聞秘書辦公室，2001年5月1日。
<http://www.arc.org.tw/mgck/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archive01/0501ndutx.htm>; accessed 20021220)。

(一) 美國反恐戰略對台灣安全影響

911 後在美國全球戰略的調整下，台灣問題最容易引起美國與中共爭議。台灣在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環境中，不論是圍堵中共或是納入美國整體的安全戰略考量，台灣顯然具備了較為有利生存發展的條件與機會（陳子平，2004：162-163）。

當前中共在解決台灣問題上，不再侷限於以國內問題作思考，採取先國際後兩岸，將對台政策從屬於大國外交下之關係，刻意突顯台灣問題作為中共與美日等大國進行正常友好關係的主要障礙，以逐步緊縮、步步進逼的方式迫使台灣就範。中共將台灣問題訴諸國際社會，潛在戰略思維本質性的轉變，對台灣生存與發展而言，實為隱憂。

儘管美國一超在體系中變成獨大，但是不能為所欲為，必要時為了國家利益還需要向中共作出妥協。台灣處於美中兩大強權戰略衝突的夾縫中，尤其 911 事件提供中美在全球反恐戰略上的合作契機，反恐戰爭越久，中共扮演的角色愈形重要，台灣應切忌成為美中關係反恐的籌碼。

(二) 東北亞主要國家對台灣安全的影響

本文所指的東北亞主要國家乃指中共、日本南北韓、與美國。在東北亞區域安全環境中，中共與日本互動對區域安全環境影響深遠，惟美國仍然居於關鍵主導地位。台灣戰略地位則為美、中、日所重視，而「美日同盟」一直是中共所擔憂的現象。由美國的亞太戰略思維暨支持日本藉反恐在「美日安保」條約中尋求「正常國家」⁴的目標，擴大日本參與國際安全活動的能力，以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的戰略作為。使得吾人在關注台灣的安全環境時，不得不將美國因素納入考量。

美日防衛合作新指針的合作範圍已由「本土有事」擴展到「周邊事態」，尤其 911 後日本對美軍支援的運作範圍已擴大到南亞與中東地區，未來雙方合作可能以處理全球性安全問題為目標，而周邊事態的解讀對台海安全與否，具有絕對性的影響。日本基於「反恐特別實施法」⁵暨「有事三法」⁶的制定，授權自衛

⁴ 改變「戰敗國」體制，提高防務部門的地位，成為「正常國家」，是日本一直努力的目標。為此，近年來日本在國防體制上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防衛廳升為防衛省和醞釀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簡稱「國安會」)。早在 2006 年 11 月和 12 月，日本國會衆參兩院就分別審議通過了防衛廳升格法案。2007 年 1 月 9 日舉行了「防衛省」揭幕儀式，防衛省正式運營，防衛廳長官隨之升格為防衛大臣。這是日本向「正常國家」邁出的關鍵一步。

⁵ 2001 年 11 月，日本實施「反恐特別實施法」：

1.1954 年來自衛隊第一次至海外從事戰時任務。2.活動範圍超越日本與所謂周邊地區。3.自衛隊使用武器條件放寬(除自衛隊外，包含傷兵、難民等)。4.期限兩年，必要時國會檢討延長。

⁶ 1999 年 5 月，美日安保新指針配套三法案：1.周邊事態法。2.自衛隊法。3.美日物品及勞務提供相互協定。

隊彈性快速的派遣，日後台海一旦有事，必將成為重要的參考模式。

當前台灣和朝鮮半島正處於「美日同盟」與中共這兩大力量的交會點上，代表亞洲海洋勢力的「美日同盟」與代表亞洲陸權力量的中共之間的戰略平衡，透過雙方在朝鮮半島以及台灣海峽的戰略地位獲得實現。這也是為什麼台灣的戰略學者一直有美外交折衝之間會以犧牲台灣而達成雙方在朝鮮半島合作的隱憂。

台灣對整體東北亞的地緣政治並未扮演直接角色，此刻應深度思考將對台灣利益產生何種影響。其中，台灣不可忽視「美日同盟」對於北韓問題在危機處理中合作的關係。因為朝鮮半島與台灣海峽對於日本是兩個平行的安全議題，「美日同盟」處理北韓問題的過程與結果會成為「美日同盟」未來處理台海問題的經驗依據（賴怡忠，2005）。由於「美日同盟」係維持台灣安全的結構性因素之一，台灣需要特別注意朝鮮半島局勢對於「美日同盟」的影響。

（三）、中共與東協對台灣安全影響

冷戰結束後，東協成為亞太地區的五大力量中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911 事件後，美國勢力重回東南亞地區，積極部署反恐戰爭的第二戰場。而中共對東協國家的睦鄰經貿外交極盡拉攏態勢，致美、日也不甘示弱，相繼與東協國家磋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對台灣而言，東協區域論壇係亞太地區目前唯一的官方性質的多邊安全對話機制，也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推行的預防性防禦戰略支柱，台灣卻無對話空間，在區域安全形成孤立狀態。東亞經濟整合型態仍在發展，亦將成為影響新世紀東亞權力互動關係的重要變數，中共企圖藉由「東協—中國自由貿易區」（AFTA-China）和「東協加三」東亞自由貿易區（EAFTA），把影響力伸近東南亞，掌控東南亞成為中國之後院，更可以進一步壓縮台灣在國際上的生存空間。

其中影響台灣最嚴重者，無非是中共取代了日本成為地區新經濟龍頭，更進一步躍升為東亞地區多邊經貿合作的領導者。反觀台灣在東南亞四處碰壁，鄰國在敏感政治議題上，寧冒風險與台灣降低政經利益關係，也不願意得罪中共。

貳、建構主義的身份與利益觀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從而帶來後續東歐自由化風潮，隨著1990年兩德的統一，前蘇聯也因1991年的「八月政變」，在當時總統戈巴契夫的主導下宣布解體，次年，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對峙的華沙公約組織也解散，自1949年以來的兩極對抗終於劃下句點。但是，主導國際關係理論的「新現實主義學派」（Neo-Realism）及「新自由主義學派」（Neo-liberalism）卻未能事先預測此種現象的產生（翁明賢，2004：5）。換言之，主流的理論無法解釋冷戰的結束及複雜的後冷戰國際

政治的現象，在如此的背景下，建構主義的國際關係研究途徑即因應而生，並挑戰主流的國際關係論述的基本命題：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倪世雄，2001：219-231）？

以溫特（Alexander Wendt）為代表的建構主義學派，雖亦認同新現實主義的一些基本理念，但強調國際政治體系的結構與新現實主義的結構不同，是一種社會意義上的結構，重視國際體系結構對體系單位的作用（莫大華，2003：第五章）。其中包括了三個要素（秦亞青，2001：23-25）：

（一）社會結構存在的條件：溫特認為「結構」的「形成」與「存在」都是行為體「社會實踐」的結果，換言之，行為體之間的互動建立了「社會結構」，而此結構是動態性的，是由完全不同的觀念所構成。所以，行為體可以建構一種「結構」，也可以分解這種「結構」，此「結構」是一種「觀念的分配」，非新現實主義所強調的國家能力的分配。

（二）物質性因素的作用：溫特強調社會結構也包含物質性因素，例如：人口、資源、國家實力等，這些物質因素只有透過「社會結構」才可能對行為體的行為產生有意義的影響。

（三）共有知識：指國家行為體在一個特定的社會環境中，共有知識建構了國家行為體的身份（identity）與利益。此處所指的共有知識（shared knowledge），被溫特定義為：「個體之間共同的和相互關係的知識」（秦亞青，2001：23-25），亦被稱之為「文化」，但是，溫特強調此種「共有」是指社會意義上的「共有」，其內在性質具有「互為合作」，或「互為衝突」的狀態，而社會共有知識則包括：規範、制度、意識型態、組織等（翁明賢，2004：5）。

另外，建構主義學者奧勒夫（Nicholas Onuf）指出建構主義是研究「社會關係」的一個新方法，主要論點是：「人是社會人，沒有社會關係就不成為「人」，或者說，社會關係使人們成為像我們現在的人類。人民建立社會，社會孕育人民，這是連綿不斷的雙向過程。在人民與社會之間，加入一個成分，即規則（rule），規則將人民與社會聯繫起來---實踐產生規則，改變規則或取消規則，一切取決實踐」（kubalkova, 1998：58-61）。換言之，建構主義是把國際關係理解為一種「社會關係」，而人是社會的人，社會關係規定了人的社會存在，同時，社會存在的人構成了整個世界。所以，奧勒夫強調「一切取決於實踐」，就是點出行為體之間運用互主性（intersubjective）的概念，持續進行有意義的社會互動過程。

溫特建構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結構不僅對行為體的行為產生影響，同時也塑造了行為體的身份。而基於「共有觀念」所建構的「身份」同時也形塑了行為體的「利益」，針對此點，溫特提出奴隸主與奴隸之間的關係，唯有在一個奴隸制的社會結構中，透過與奴隸的互動關係，奴隸主才能為奴隸主，從而作出符合其身

份的行動。上述的「共有觀念」形成三種無政府狀態文化，包括：「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與「康德文化」，這三種無政府狀態文化的主要特徵為：敵人、競爭者與朋友，並通過三種途徑來達到此目的：通過主權行為體的演變、行為體漸進式的合作及國際勢力轉變「利己的認同」為「集體的認同」(Ringmer, 2001: 231)。換言之，溫特以為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並非一成不變，端賴兩個行為體想要形成何種無政府文化關係，亦即兩國主觀上要建立何種「身份」的問題。

溫特借用懷特(Wight)的英國學派語言，提出霍布斯、洛克、康德的三種無政府狀態文化；他認為，霍布斯的結構是自助(Self-help)體系，因此根本沒有無政府狀態的邏輯(Wendt, 1999: 246-248)。霍布斯文化的邏輯是「敵意」，就是所有人反對所有人，「自我」將「他者」再現為「敵人」；國家會採取改變現狀的方式摧毀或征服敵人，決策時不顧未來地往最壞處考量，而此時的相對軍事力量就非常重要，且會以對待敵人的方式去無限制地使用暴力。洛克文化的邏輯是「競爭」的角色結構，這種「自我」將「他者」再現為「對手」的意義，不若敵人那麼具威脅性；國家期望相互行為的基礎是承認主權，承認對方的生命、自由、財產，但對手畢竟有競爭到爭執的可能，甚至有時會激化到使用暴力。康德文化的基礎是「友誼」的角色結構，此時「自我」將「他者」再現為「朋友」；國家期望相互遵守不使用戰爭的非暴力規則，以及雙方共同抵禦第三方的互助原則，因此產生多元安全共同體、集體安全等概念，對相互和平的意願與行為具有共同知識。

至於「身份」一詞，溫特強調國家是一個可以具有「身份」和「利益」的實體(行為體)。他定義「身份」為：作為有意圖行為體的「屬性」，根據此「屬性」可以產生「動機」和「行為特徵」。所以，身份是一種主體或單位層次的特徵，並建立在行為體的「自我領悟」上，而此種「領悟」的內容通常依賴其他行為體對一個行為體的再現，和這個行為體自我領悟相一致的結果(秦亞青, 2001: 282)，例如有人可能以為他是一個師父，但是如果他的徒弟不這樣認為，則他的「身份」在與他的徒弟「互動」中就起不了作用。溫特認為有兩種「觀念」可以進入「身份」，一種是自我持有的觀念，另外一種是他者所持有的觀念。是故，身份是「內在」與「外在」的結構所建構而成的。

在「利益」部分，溫特將它區分為「客觀利益」和「主觀利益」，是一種需求和功能的要求，也是再造身份的重要因素。而這種需求是客觀的，一旦國家行為體內化了這些身份，就獲得兩種特性：1.領悟自己的要求，2.依據此種領悟來獲取行動(秦亞青, 2001: 290)。事實上，如前所述「身份」決定「利益」的邏輯思考，溫特以為有以下的四個相互關係：1.身份指的行為體是誰？或者是什

麼樣的內容；2.利益是指行為體的需求，利益顯示有助於解釋行為的動機；3.利益是以身份為先決條件，因為行為體在知道自己是誰之前，不可能知道自己需要什麼；4.沒有利益，身份就失去了動機力量，而沒有身份，利益就失去了方向（秦亞青，2001：290）。另外，溫特強調「主觀利益」是指行為體對於怎樣實現自我身份需求。所實際持有的「信念」，而這些「信念」構成了行為的「近似的動機」（proximate motivation）。即理性主義者所稱之「偏好」與「意願」；不過，此種偏好是一種動機，而不是一種行為，而意願是指一種對怎樣實現需求的理解，所以意願加上信念成為行為本身（秦亞青，2001：291）。

再則，國家利益的概念可以被指涉為在複雜的國際關係中，維護本國和本民族免受外來侵害的一些基本原則，也是國家制定對外目標的主要的依據和關鍵因素（倪世雄等，2001：252），亦可以稱之為一個國家賴以生存與發展的主觀精神需求與客觀的物質需求的總和（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2001：40）。現實主義學派則認為國家利益有以下四個特性：1.國家利益為國際政治的本質，決定國家的對外行為準則；2.國家要根據其能力為標的來追求其利益；3.實際主義和權力為國家利益的基礎；4.外交決策要用權力的標準去估量，而不能使用一般的道德觀念或個人的道德標準來評估（林碧炤，1990：282-283）。至於國家利益的構成要素則可簡單區分為國家領土、國家安全、國家主權、國家發展、國家穩定與國家尊嚴等（翁明賢，2004：40-44），包括主觀的國家利益內容與客觀情勢的利益。

不過，建構主義的國家利益不是外生於體系結構，而是由體系結構所建立的；不同的文化結構建構不同的利益，同時此種利益為客觀利益，係指國家—社會複合體的再造需求或安全需求。溫特以為此種客觀主義的方式，反映了：回答國家應該做什麼這個規範問題，而非回答國家實際上做什麼這個科學問題。是故，客觀的國家利益係指一種指導行動的規範性原則，而且有其因果意義的，可以促使國家採取某種行動的力量（秦亞青，2001：293）。

參、建構主義的文化戰略模式與核心概念

本文指涉的文化，亦即霍布斯的、洛克的、康德的文化，取自國際關係的建構主義概念。基本上，建構主義是研究（任何種類）社會關係的方法，立足於自己的觀念與命題體系，以各式各樣的方法，研究流行和複雜的主題。充滿著各種不同聲音的國際關係，可適用於建構主義的分析（Onuf, 1998：58）。

本文所引用的文化概念，來自於溫特（Alexander Wendt）主張。他認為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雖然對國家的動機是基於相對利得（Relative Gains）或絕對利得（Absolute Gains），意見相左，但理論起點都是自利的（Self-interested）（Alexander Wendt, 1992：391-392）。可是，自利的立論卻忽略認同和利益的形成問題，因此他運用社會理論，解釋認同和利益的問題。

溫特指出，社會結構有三個要素：分享知識、物質資源、執行（Wendt, 1995：73-74）：

- （一）社會結構藉由分享瞭解、期望、知識來定義，這些構成行為者的情境和他們關係的性質是合作或衝突，例如安全共同體或安全困境。
- （二）社會結構包括物質資源如黃金、坦克，其對於人類行為的意義，在於分享知識鑲嵌其中的結構，例如五百件英國核武小於五件北韓核武對美國的威脅。
- （三）社會結構的存在，不在於行為者數目或物質能力，在於實行，例如冷戰是管理強權四十年的分享知識結構，一旦他們停止了這個基礎的行動，冷戰就結束了。

在溫特的論述中，國家是行為主體者（Agent），文化是結構（Structure）之一，行為主體者的互動形成了結構，結構也會對行為主體者產生影響。換言之，國家在互動過程中，因為分享知識、物質資源、執行等社會結構要素，產生觀念、界定身份、形塑利益，因而建構了文化等結構；相對的，文化結構也會對國家的利益、身份、觀念產生建構作用（黃清賢，2010：4）。

溫特雖然同意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無政府狀態（Anarchy）前提，亦即國際結構是沒有中央權威的無政府狀態，但他卻認為無政府狀態不只一種邏輯，至少有敵人（Enemy）、對手（Rival）、朋友（Friend）三種角色在主導體系（Wendt, 1995：73-74）。

溫特主張，共有觀念的內化（Internalization）愈高，愈能產生作用，建構的文化程度愈強。因此，他認為三種文化各有三個等級，亦即霍布斯文化可能由深層的共有觀念建構，康德文化也可能由弱勢的共有觀念建構；就像理念主義認為共有觀念可能導致衝突，物質主義認為物質力量可能造成合作。

第一個等級中，國家會遵守規範是因為受到外力威脅，所以不是自願服從，是迫於外力而不得不遵從，而一旦外力消失就必定違反規範。第二個等級是出於利己動機而遵守規範，因此這種服從只是工具主義性質，一

旦遵循的成本大於收益，國家就會改變行為模式。第三個等級是因為國家承認規範具有合法性，所以遵守規範。

溫特認為，內化的三個等級，產生威脅、利己、合法性的三種實現文化途徑；威脅方式再造的文化最不穩定，合法性方式再造的文化最穩定。他指出，隨著時間的推展，如果規範與國家的需求符合，規範就會迅速從第一到第三等級的內化；但如果不符合，則內化的速度就緩慢。

國際體系是否也會隨著時間推展，從霍布斯到洛克再到康德文化，溫特語帶保留。但他樂觀的表示，霍布斯文化的敵意造成高傷亡比例，因而出現創造洛克文化的契機；洛克文化的競爭出現毀滅性武力，因而產生發展康德文化的動力，所以歷史是朝著進步的方向前進（Wendt, 1999：310-312）。

應用上述的概念而言，霍布斯文化的戰略模式是消滅敵人，所以國家會動員一切可以運用的資源，盡其所能的摧毀深具敵意而不具有合法性的對方，藉以維繫自己的生存安全；洛克文化的戰略模式是在與對手的競爭中，尋求比對方更多的利得，因此雙方還是存有緊張關係；相對於霍布斯文化而言，雖有衝突但敵意已降低許多；至於康德文化的戰略模式則是將對方視為朋友，既是朋友則合作就有可能，互助以增進共同利益的理想就有可能推動。

文化建構的程度愈強，共有觀念的內化程度就愈強；而外力威脅、利己動機、承認合法性是內化程度的三個等級，威脅、利己、合法性依序對文化產生愈來愈強的建構作用（黃清賢，2010：5），因此當國家願意承認規範的合法性時，該階段文化愈能強化。

如果對照學者奈伊（Joseph S. Nye, Jr.）提出的柔性權力（Soft Power）而言⁷，「軍事權力的威脅、經濟權力的利誘、柔性權力的價值觀接受」分別是權力的三種類型（Nye, 2004：30-32）。恰好與前述共有觀念內化的三個等級「威脅、利己、合法性」相呼應，換言之，當規範的合法性受到承認，亦即透過接受價值觀的柔性權力影響時，該文化的戰略才是真正成功的。

溫特將無政府狀態作為等待填入文化的空殼，並設定三個內化的程度。三個內化層次約略分為：受到力量驅使，不得不從---被迫（武力）；為了追求利益而行動---主動（代價）；感知規範制度的正當性而服從---觀念（建構）。而主要

⁷ 中共稱 Soft Power 為軟實力、Hard Power 為硬實力，相對的，台灣則分別翻譯為柔性權力、剛性權力。

的三個文化為霍布斯、洛克、康德。此三個文化為溫特所區分，但他表示這是「至少」擁有的三種，因此，尚有其他文化的可能並沒有被否定。本文將運用三個文化對角色認同的差異性、三者對認同上的邏輯，以及互動基礎準則的部分，來說明不同行為者或行為體，對兩岸關係的認同差異與可能的影響。

單就三種文化來討論，在國際社會無政府為霍布斯文化時，由於處於戰爭背景中，受到結構壓迫，產生的邏輯是消滅對方的存在或被消滅（Wendt, 1999：259-278），因此行為者之間的角色認同是敵人，自身的生存是最重要的。目前的國際社會在客觀上或許是以洛克文化為主，但如果把宏觀中（國際社會）的客觀狀態排除，只以目前行為體的主觀認同而言，所謂霍布斯文化中的敵對關係，比較廣義的理解應該導入主權，也就是說，邏輯是消滅主權或主權被消滅。或許霍布斯文化令人聯想到現實主義（戰爭、生存安全、權力極大化、追求相對軍事力量確保不受威脅等），但溫特卻表示沒有必然的連結性，也就是在內容的重疊性，並不代表霍布斯文化完全等於現實主義。不論如何，溫特也是點到為止，沒再說明霍布斯文化與現實主義的關係⁸。

若無政府為洛克文化時，對主權的重視則成為主軸（秦亞青，2001：279-296），邏輯為不消滅對方的共存，即便發生戰爭，目的只是為了改變現況，而不會消滅對手。在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上有平衡點，由於有共存獲利的概念，視彼此為競爭對手，既競爭卻也合作。一般來說，維持現狀是常見的，並透過其他規範秩序來維持秩序，因為如此一來能夠確保自身的利益。不論如何，其中的一些觀點與新自由主義是重疊的。

而無政府為康德文化時，非暴力與互助被正當地規範化，並有共同安全的邏輯（秦亞青，2001：297-308），彼此之間的角色認定自然成為盟友。不過在康德文化中卻產生一些問題，其不同於前兩者之處為，霍布斯文化與洛克文化在宏觀與整體層面的主體都是國家，但換到康德文化時，其描述的主體卻是人，這對於原本使用上需要轉換不同文化的社會建構，又增加一道使用上的難度。此外，現今的全世界，也沒有真正形成共同安全體的狀態，因而是一種過於理想的認同文化。

然而，即便溫特說明社會結構的觀念分配，且三種文化有層次關係，但卻表示未來走向是非指向性的（不一定是只朝向和平美好的未來），但也不太可能倒退（秦亞青，2001：308-312）。不論如何，其實霍布斯文化一直是基礎的情況

⁸ 有關霍布斯文化與現實主義者的關係，或許在內容重疊程度不低，然而Wendt 提出的三種文化，包含霍布斯文化在內，卻還存在內化程度的差異。詳見Alexander Wendt,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下，加上現階段國際大致上處於洛克的背景中，要倒退可能需出現軍事武力絕對強勢的超強權，並且其有意將全球攻佔消滅他國。

肆、我國的國家利益與安全戰略

一、不同時期的國家安全戰略

從冷戰時期至今，台灣面臨不同國際戰略情勢與幾位不同領導風格的總統，因此呈現不同的國家利益思考與安全戰略的產出。首先，在蔣中正總統時代，兩極對抗方興未艾，美、蘇從歐洲、近東到亞洲的權力範圍之爭，加上兩岸分裂、對峙，不管國際無政府文化與兩岸互動環境，呈現霍布斯第三等級內化的敵對態勢。當時台灣屬於一黨專政，主導國內統治文化的發展，使得台灣的國家身份，不管是團體或個體身份都保持一致性。至於在國際對抗的無政府文化下，形成與中共對抗的角色身份、與美國形塑反共集體身份關係。在國家安全戰略方面，雙方都不承認對方「主權」、「生存權」，抱持以武力來改變現狀的政策作為。

其次，在蔣經國總統時代，國際局勢呈現緩和現象，主要在於中、蘇意識形態與全球勢力爭奪產生變化，加上美國著手改變亞洲政策，採取「聯中制蘇」戰略，開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此時的國際戰略態勢，美蘇依然呈現霍布斯狀態第三級，但是中、美卻朝向第二、第一級方向移動，但是，兩岸態勢沒有結構性的改變，依舊保持敵對，只是某種程度朝向僵持性對抗的冷和平態勢（翁明賢，2010：195～196）。當時台灣的個體與團體身份依然一致性，沒有任何政黨挑戰其國內主權統治文化，在國際無政府文化下，台灣維持兩岸敵對角色，以及與西方民主政體身份的建構。在安全戰略方面，蔣經國改變「武力反攻」政策，代之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意識形態為號召。

到了李登輝時代，國際呈現後冷戰態勢，兩極對抗瓦解，國際無政府文化從霍布斯走向洛克競爭文化（翁明賢，2010：196）。兩岸互動也呈現和解態勢，由台灣單方面表現「承認兩岸分裂分治」現狀思維，1990年代陸續成立陸委會、國統會、海基會，並訂定「兩岸關係人民條例」。但是，北京方面，始終不放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兩岸無政府文化還是處於霍布斯文化狀態，台北的國內主權統治文化上未受到嚴重挑戰，從黨外運動，到反對黨的正式成立，尚未影響到國民黨的執政地位，台灣的個體、團體身份並沒有分裂，同時，在國際上，台灣不斷強化西方民主集體身份的建構，努力於和緩與中共的敵對角色身份關係。在安全戰略方面，台灣致力於民主政治的改革與經濟建設發展，維持台灣穩定的發展態勢。

再到陳水扁總統主政期間，透過不斷地對中共釋出善意，意圖緩和兩岸緊張關係，惟仍無功而退，關鍵在於陳總統有關兩岸的表述，雖口頭堅持「四不一沒有」承諾，卻一再否認「九二共識」，尤其緊接而來的相關表述，從「沒有共識的共識」、「九二精神」到「一邊一國論」，實質悖離「四不一沒有」的精神，即使致力尋求朝野能獲致兩岸政策的原則共識，跨黨派小組所達成的共識仍無法消弭朝野間的落差，使得陳總統主政八年的兩岸關係始終很難透過復談來打開僵局，台灣朝野間的對立亦不易經由凝聚兩岸政策共識來鬆緩進而達成和解，結果是攸關兩岸人民福祉的諸如三通直航、兩岸共同打擊犯罪等議題無法透過兩岸復談加以解決。此時，台灣的個體、團體身份亦仍能維持，而在國際上，台灣亦不斷強化西方民主集體身份的建構。迄中共制定並通過「反分裂國家法」，益加使得兩岸關係甚至美、中、台關係備受挑戰與考驗。上述陳總統的論述，似使兩岸關係在洛克文化與康德文化之間徘徊。

至於馬英九總統，他的大陸政策有「三道防線」⁹：

第一道是兩岸和解的制度化。在「九二共識」下，兩岸已簽署十五項協議，六次江陳會正逐漸在落實ECFA架構下的各項合作。

第二道防線是增加台灣在國際發展上的貢獻。在經濟方面與東南亞地區建立綿密的商業與人脈網絡，使國民享有高品質的生活；在外交方面能扮演一個「負責任的利害關係者(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的角色，如對日本震災人道援助。

第三道防線是將國防與外交相結合。首先要對美國建立起信用與信任，並對相關國家做完整的溝通；其次要強化自我的防衛力量。

馬總統說：「國家安全必須建立在國內完整的政治支持上」。並承諾會嚴守「不浮誇」與「無意外」的界線，使台灣成為一個「和平締造者」、「人道援助提供者」、「文化交流提供者」、「新科技與商機創造者」和「中華文化領航者」。上述馬總統的論述，亦有將兩岸關係引向康德文化的傾向。

是以，透過台灣在上述階段的國際無政府文化的演變、兩岸互動過程、國內主權統治文化的發展，進而影響台灣的國家身份的變化，主導台灣的客觀與主觀利益的演進，從而建立台灣的國家安全戰略與政策。但是，經歷民進黨執政八年，呈現不同以往的國內與國際文化、國家身份與利益需求。

⁹ 2011年5月12日，馬英九總統應華府「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簡稱CSIS)」之邀，以「新時代的美台關係」為題，描繪他的大陸政策有「三道防線」，第一道是兩岸和解的制度化；第二道防線是增加台灣在國際發展上的貢獻，主要在經濟與外交兩方面；第三道防線，是將國防與外交互相結合。本文刊載於100.5.23中國時報A15版。

二、國際層次的文化認同差異

兩岸關係就結構現實的觀點來看，其權力分配是極度不均等的，台灣與中共的不平衡之所以維持，是因為外部有美國作為平衡的槓桿，而台灣的穩定也幾乎取決於兩國實力的消長，並受困於這種環境而難以脫身（Swaine, 2004: 39-49）。

若運用社會建構，以國際層次的文化認同而言，兩岸關係在過去，由於冷戰圍堵與國共內戰等因素影響，不論由美國、中共，還是台灣來看待兩岸關係，基本上都認定兩岸關係是處在危險的霍布斯文化。但自從中共改革開放、兩岸展開意見交流，整體觀念就逐漸開始改變，或至少從策略轉變上能觀察到（翁明賢，2007: 379-383）。觀察2008年與其後的兩岸關係，台灣所跨出的一步是外交休兵、兩岸和平發展，中共所做的回應是「胡六點」¹⁰的兩岸方針，美國則表示，樂見兩岸發展和平關係。乍看之下，兩岸關係似乎在整體上已經脫離霍布斯文化了，但其實美國、中國，與台灣，三方對兩岸關係反而抱持各自不一的解讀，也可稱為三方所希冀達成或維持的目標。

就美國方面，除最初的歷史因素之外，為了其自身利益，仍然認為兩岸維持現狀是最好的。美國一方面需要與崛起的中共交流往來，一方面也需要一些控制力足夠的籌碼（王高成，2009: 279-311）。對美國而言，兩岸關係是單純的狀態，利益的成分以物質性的居多，對於兩岸維持現況的需求並不像中國的兩岸統一訴諸民族情感性質的。

以社會建構而言，美國的歐巴馬政府對於兩岸目前外交休兵與務實和平發展的兩岸關係表示支持，並樂見其成。這意謂美國至少到目前為止（或許時間點更早），開始認為兩岸關係已經是洛克文化的狀態（如同目前國際間主要的文化認同），而不再是消滅對方的霍布斯文化。美國觀念的轉變，同時可能來自於是近年來中國對於國際的貢獻與表現，實例有六方會談，或者轉變南海爭議為合作途徑（Shambaugh, 2005: 64-95），甚至在美國金融危機後，又更加強化中國逐漸融入洛克文化（目前國際社會的文化階段）的想法。因此，融入洛克文化的中國與台灣所產生的兩岸關係，自然處於洛克文化的狀態。

¹⁰ 2008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藉北京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三十周年的機會，發表了《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公開講話，提出了六點對台政策方針，被視為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時期後中共對台政策的新綱領。內容包括：1、恪守一個中國，增進政治互信。2、推進經濟合作，促進共同發展。3、弘揚中華文化，加強精神紐帶。4、加強人員往來，擴大各界交流。5、維護國家主權，協商對外事務。6、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

中共方面，2008 年底胡錦濤發表「胡六點」時，也再次界定兩岸關係，認為自1949 年以來，大陸和台灣儘管尚未統一，但不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上世紀40 年代中後期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這沒有改變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¹¹。也就是說，中共認為兩岸根本沒有分裂成兩個獨立的國家，這是內部問題，而現在是中共代表中國主權，台灣的政權是非主權，或者已經被取代的歷史朝代之一，又或是一個內部政治混亂下的遺物。而今後要將兩岸統一，如同補足曾失去的物件一般。中共還運用多種手段來正名和切割與美國友好的盟國力量，試圖讓美國介入亞太的力量減少（Bostock, 2005：15）。其中原因也包含保障自身在區域中的地位影響力，在兩岸議題上能保有優勢。

台灣方面，以社會建構而言，台灣在觀念上的改變可能是如同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於國會所言，「中國不是敵國」。就「中國不是敵國」的言論來分析，所謂不是敵國即表示沒有進攻的意圖，也就是沒有敵意，因此在沒有戰爭可能性的情況下，應該歸類在康德文化。但在目前中共仍未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前提下，台灣應視兩岸關係為洛克文化。

因此，如果將國際社會的焦點單純擺在兩岸關係，綜觀兩岸關係在國際層次的文化認同差異，以美國、中共、台灣的觀點來看，三方對兩岸關係的文化認同上其實是不同的。美國雖然常認為兩岸具潛在衝突危險性，至少在過去的歷史確如此，也特別突顯，但近來經過兩岸互動表現的逐漸改變，已認為是相互競爭共存的洛克文化。中共近來也已經釋出善意，並且互動關係逐漸熱絡，但由於堅決的「一中」政策，甚至常刻意忽略「各表」，諸如《反分裂國家法》，或是堅持一中框架為未來互動的前提，仍企圖在最後消滅台灣主權形成一統，因此還是霍布斯文化。然而，台灣認為兩岸互動發展已使關係友好化，也有視兩岸為盟友關係的傾向，此外，執政黨的「新三不政策」雖具備維護主權現狀的條件（乍看之下會誤以為是洛克文化）¹²，卻也包含反對武力、戰爭的意見。於此基礎上，台灣企圖讓兩岸產生安全互信且互助的關係，加上近來政策方針的實行，可見台灣對兩岸關係的態度朝向康德文化來發展。

三、國內層次的文化認同差異

¹¹ 胡錦濤在演說中表示，兩岸統一是內部問題，並且不是主權和領土再造，而是結束過去以來的政治對立。詳見胡錦濤，2008 年12 月31 日，〈「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 周年座談會演講稿〉，<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18824/2008/12/31/2225s2379738.htm>。

¹² 馬英九於2008 年5 月20 日總統就職演說所言：「我們將以最符合台灣主流民意的不統、不獨、不武的理念，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台灣海峽現狀。」詳見〈中華民國第12 任總統就職演講稿〉，http://www.rti.org.tw/big5/topic/2008/520/news_080520n.aspx。

除了在国际層次，美國、中共、台灣對於兩岸關係的認同都不相同之外，在台灣內部也有不同的文化認同。如同「中國不是敵國」的思維，現階段的執政黨與其執政團隊或支持者，他們可能認為與中共是處於洛克文化與康德文化之間，應以朋友的方式來互動。在本文中，以「執政黨」代表這些以康德文化看待兩岸關係的意見群體。

反對黨與其相關團體人士，對於執政黨的中共政策表示不滿。就社會建構的角度而言，反對黨與其支持者認為與中共的關係是處於霍布斯文化與洛克文化之間，必須處處小心提防，對中共的態度要不友善許多。比起早期台灣與中國所結下的霍布斯文化關係，若執政黨目前已經改觀為康德文化，則反對黨是保留那些認同，甚至在近幾年來受到中共的文攻武嚇，以及先前執政時期前後所受到的壓迫，都強化了這些以往就被灌輸的霍布斯文化認同。基於這些因素，反對黨人士與中共的協調空間被認為是不足的，即便現今中共經常釋出願意溝通的善意，但在他們眼中，這些舉措均為糖衣毒藥。

若從現階段反對黨堅持的認同來看，未來可能產生幾種變化，其中一種是就價值觀念與意識型態大於實質利益的考量而言，因此將會持續認定兩岸關係為霍布斯文化；另一種從較為現實的實質利益衡量推論，若國家急需經濟利益，又要符合保有主權立場的狀態，反對黨可能將轉變成表面上的洛克或康德認同，實際上還是以霍布斯認同為主，來提防中共。因此仍屬於霍布斯文化。

台灣社會若將「執政黨」與「反對黨」的意見群體先去除，只討論中立選民或稱立場較為客觀中立的一般民眾，他們可能視中共為競爭的對象，以洛克文化的方式來認定兩岸關係。雖然他們不一定認為兩岸皆有主權，也不一定支持兩國論的說法，但清楚意識到兩岸是各自有其政治領域、互不相轄的政治實體，並且能合作卻也競爭，還有更多不同形式的衝突等待處理。然而洛克文化，最糟的情況下還是會發生戰爭，只是相較過去而言，現況下的可能性很低。但不論如何，他們或許認為兩岸這種微妙狀態至少到現今仍然是持續的，而維持現況將是保障多重利益的最好方式。從陸委會的長期民調中可看出，一般民間對兩岸關係多是以維持現狀為主，甚至永遠維持現況的比例持續上升¹³（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09）。

總而言之，台灣內部不論是哪一方，都有其所想達到的目標，不論是冀望的利益或概念上的立場。假設這種內部衝突是單純的物質利益衝突，則問題比較好解決。然而，基於社會建構的角度來說，台灣的執政黨、反對黨，以及一般民間

¹³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民眾對兩岸關係的看法〉，2009年12月，<http://www.sef.org.tw/public/Attachment/01410152671.xls>。

對於兩岸關係的認同卻是不同的，這種包含概念上的衝突卻不是一時半刻就能處理完成的。

執政黨與反對黨的認同差距，或許產生難以解套的對立，但不論是霍布斯文化或康德文化作為主導政策走向的認同，都不能配合一般民間的洛克文化認同，因此在實踐上與民眾的期望落差往往也很大，使得原先預期成果受限。以一般民間的洛克文化認同而言，中共還是可能攻擊台灣，但只要兩岸關係維持穩定，戰爭可能性將大幅降低。而一般民間所尋求的正是在維持穩定的限度內，退一步能保障目前生活，進一步讓台灣能獲得良好的競爭環境與地位。

伍、我國的文化安全戰略發展趨向

基於上述分析，有關國家行為體互動產生無政府文化的三種類型：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與康德文化，進而推斷出基於有意義的「社會互動」產生相互的「身份」，並進而導引出不同的：敵人、競爭者與朋友的「安全利益」關係。未來台灣應有的安全戰略思考，即在於了解全球化下的安全環境變化，進行國家體質與政府結構的調整，發揮不對稱戰略的思維，擴大自身的優勢作為，克制敵方的弱點。並且增強台灣硬權力與軟權力的交互應用：影響力與吸引力的建構，強化台灣的正面民主化形象，促進世界輿論認識台灣與中共之間的區隔，並以大陸政策為主軸的國家安全戰略與政策：主動、積極、全方位的釐定戰略與戰術的作為。

第一，我方要有因勢利導的戰略，在全球化下爭取台灣和平的發展機遇期來整合我對中國大陸的經濟戰略與經貿發展，切割大陸關鍵產業市場，以我方最具優勢的電子資訊產業來進行對大陸新東進政策，建構兩岸資訊產業的垂直分工、中心與邊陲的指導關係。換言之，分離雙方的政治、經貿關係，以建立可操之在我之經濟戰略，兩岸ECFA的實施，即是對雙方有利的安全利益。

第二，有關雙方「身份」問題，目前宜從「競爭者」的角度去思考，強調兩岸是政治制度之爭，並且主動出擊、創造議題，例如，關於「一個中國原則」的再定義問題。「一個中國原則」有不同的版本，重點在於誰能掌握論述的主導權？我方應該突顯出「一中」是一個可以討論的話題。換言之，一中可以切割為：「政治一中」、「經濟一中」、「社會一中」、「文化一中」或「歷史一中」等論述內涵（翁明賢，2004：10～11），雙方可以就有共識的部分加以討論，其目的是要建立兩岸的互信基礎，避免觸及「政治一中」之後，國家主權與定位就產生紛爭。另外，將兩岸納入亞太安全戰略架構下來思考，建構與其他周邊國家擴大合作與解決衝突的利基作為，例如，處理南海諸島紛爭問題突顯出台灣與中共在亞

太可以發揮的戰略作為，亦是加強兩岸合則得利的身份關係。

第三，依據建構主義觀點，社會行為體之間有意義的互動過程，才能產生雙方的「共有知識」，才能形塑新的無政府文化關係，所以，迎接兩岸談判時代的來臨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從「胡六點」聲明的內容顯示出中共準備進行兩岸談判的思維，對北京而言，若能引導台灣上談判桌，就是其戰略上的主要目標，我方則必須要瞭解不可迴避的談判壓力，透過議題的設定、人才的徵募、狀況模擬與沙盤推演，做好談判的先期準備工作，這也是第二項可操之在我的部分。

第四，兩岸經貿自由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到「兩岸聯盟」的階段性思考，為了因應中共對台灣的經貿壓力，避免產生以商圍政、以民逼官的政策效力，我方應善用兩岸ECFA經濟協議與發展的架構，仿效歐洲聯盟以經濟整合促成政治融合的效果，易言之，兩岸聯盟為兩岸和平發展的工具性運用，不涉及到兩岸主權爭議的問題，成立類似兩岸高峰會議、兩岸部長理事會來處理攸關兩岸紛爭的課題。

第五，關於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建立，這是兩個國家行為體之間最敏感的交流關係，依建構主義言，若兩岸形塑非敵人之無政府文化狀態，雙方之競爭者身份可以引導雙方向之良性安全利益發展，依照軍事互信原則與措施，我方立即由業管單位推出一系列的互信議題，並透過美國、日本、南韓、菲律賓與越南等國進行西太平洋海上軍事互信論壇，透過具體的紛爭議題的討論，未來可望建立西太平洋軍事安全與互信合作組織，並擴大兩岸之間的安全合作空間。

第六、在外交方面：

（一）兩岸共識：儘早確立「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架構下之外交論述與路線圖。在兩岸擱置爭議、相互正視現實的前提下，積極爭取有意義的國際參與、適當的國際活動空間、穩定現有邦交國，創造「互利雙贏」。

（二）政府機構問題：強化綜合性外交功能，不侷限於傳統主權外交，整合各部會外交職能，加強國安會、行政院、外交部協調統合涉外事務。國安會與外交部應致力於國安政策及外交事務之協調聯繫，兩者之間不宜為從屬關係，並加重行政院主管涉外事務的政務委員之權責，俾強化涉外事務之推動與統合。

（三）研究機構問題：儘速在國家安全體系（如國安會）成立綜合安全與外交政策研究中心，進行國家安全政策研究，並結合二軌外交機制，加強對區域內綜合性安全、人類安全等重大議題發展與研究之掌握，提供我國安決策之參考。

（四）涉外人力運用：建立涉外事務人力資源管理機制，借重資深及退休涉外人力，積極參與多邊國際組織，尤應善用我國參與世界貿易組織、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亞洲開發銀行等現有管道與機制，透過多邊外交場域增進涉外人才歷練，以提升我國涉外事務量能。

(五) 經貿外交導向：以洽簽自由貿易協定為導向的經貿外交，積極參與區域經貿整合，開拓雙邊經貿合作機會，加強我經貿外交量能，並強化經建會、外交部、經濟部（國貿局、對外經濟談判代表）、農委會等相關部會之間的協調合作平台。

(六) 整合兩岸事務：加強政府涉外與兩岸事務之政策協調與整合，於外交部等各涉外部會內增設兩岸關係小組，並進行人員輪調，同時設置定期協調機制，以交流、統合政策訊息，肆應兩岸事務之最新發展。

(七) 邦交經營：在確保兩岸關係穩定的前提下，戮力於邦交國之經營，以維持合理、適當、必要的制度性雙邊合作關係。

(八) 公共外交：提倡民主價值同盟，創造務實論述，透過公共外交途徑，結合民間及第三部門資源，提升台灣國際形象，累積柔性國力。

(九) 雙軌外交：推動雙軌外交，增加台灣獎學金，吸納更多外籍學員來台研習、參訪，並有效整合既有之遠朋班、解放軍國際研究班等，俾利經營與發展長期性友誼與實質關係。

(十) 援外合作：落實國際經濟合作委員會應有之功能，進一步確立法制化、透明化、專業化的援外機制與作業程序，以提供國際經濟援助與人道救援。

陸、結論

從相互依賴、共同命運、同質性、自我約束的四種變數觀之，尤其是近期ECFA的簽署確實兩岸有往康德文化發展的趨勢。但內在矛盾還是有可能讓和平穩定的現況，被迫轉化到自身的反面，例如台灣在相互依賴方面的敏感性與脆弱性、兩岸在共同命運方面的薄弱認知。兩岸在同質性方面的存有差異等，至於兩岸官方在自我約束方面雖頗為用心，但涉及主權爭議的擦槍走火仍不無可能。

縱使六次江陳會已簽署十四項協議、達成一項共識，但執行的成效仍待加強，例如兩岸空運航班數目不足、重大食品安全個案仍待協處、重大經濟犯遣返的急迫順序需要訂定，以及ECFA簽署後的貿易便捷化、海關、金融、電子商務、產業合作、提升中小企業競爭力等合作，而這些都是兩岸要推動康德文化時所需努力的具體事宜。

因此，若要建構我國文化安全戰略朝良性的模式發展，使得更符合時代的需求，則必須確保兩岸關係從洛克文化往康德文化前進，而不是退回霍布斯文化。台灣未來在國家安全的維護上，從如何整合理念因素和物質條件的方向來思考，則需使ECFA簽署後的貨品服務貿易與投資增加、對抗全球化經濟問題的合作增加，人員的交流互動增加，因為量變造成「質量互變」的正向質變，使得敏感性

與脆弱性、共同命運的忽視、同質性的排斥等矛盾因數「對立統一」於互相體諒的朋友定位，兩岸敵對關係「否定之否定」的揚棄為友誼關係，中國大陸尊重台灣的地位，台灣珍視中國大陸的善意，則兩岸共存共榮的康德文化結構即可建構完成。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一) 專書

- 王高成主編。2009。《當代戰略思想之省思與前瞻》。台北：時英出版社。
- 林碧炤。1990。《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五南圖書公司。
- 莫大華。2003。《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與安全研究—第五章》。台北：時英出版社。
- 倪世雄等著。2001。《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陳玉剛、陳志敏。2000。〈構建主義：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之後〉，任曉編，《國際關係理論新視野》。北京：長征出版社。
- 秦亞青。2001。〈譯者前言〉，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著，秦亞青譯，《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翁明賢主編。2007。《新戰略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
- 翁明賢。2010。《解構與建構：台灣的國家安全戰略研究(2000~2008)》。台北：五南圖書出版。

(二) 期刊

- 唐永聖、程南海1977。〈關於綜合安全〉。《歐洲》，第三期。北京，頁43。
- 賴怡忠。2005。〈建立台灣對朝鮮半島局勢的安全自覺〉，《台灣思想坦克雙月刊》。
- 黃介正。1999。〈跨世紀美國亞太安全戰略—華府觀點〉。跨世紀國家安全與軍事戰略學術研討會，國防大學主辦。
- 黃清賢。2010。〈海峽兩岸從競爭走向合作的戰略模式——從霍布斯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辯證〉。兩岸競爭力論壇學術研討會，台灣綜合研究院、中華經濟研究院、全國經濟綜合競爭力研究中心、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國務院參事室業務司主辦。福州，頁4。
- 羅致政。2003。〈布希主義與美伊戰爭〉。《國防政策評論》，3卷3期，頁57-69。
- 翁明賢。2004。〈全球化下國家安全戰略的另類思維：建構主義的觀點〉，《新世紀智庫論壇》，第27期。台北，頁5。

(三) 論文

- 陳子平。2004。〈911後台灣安全環境研究〉，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戰略與國際事務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四) 網站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民眾對兩岸關係的看法〉，2009年12月，<http://www.sef.org.tw/public/Attachment/01410152671.xls>。

二、英文部分

(一) 專書

Kubalkova, Vendulka, 1998, Nicholas Onuf and Paul Kowar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M.E. Sharpe Inc.

Nye, Joseph S. Jr., 2004,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Affairs).

Wendt, Alexander,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二) 期刊

“A New U.S. Strategy for a Changing Asia,” *RAND Research Brief* (May 2001): 8.

Latham, Robert, 1996, “Getting Out From Under: Rethinking Security Beyond Liberalism and the Levels-of-Analysis Proble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5, No.1, pp. 77~108.

Bostock, Ian, 2005, “US Alliance Disturbs Australian-China Clam,” *Jane’s Defense Weekly*, Vol. 42, No.11, p. 15.

Onuf, Nicholas, 1998, “Constructivism: A User’s Manual,” in Vendulka Kubálková, Onuf, Nicholas and Kowert, Paul,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Ringmer, Eric “Alexander Wendt: A Social Scientist Struggling with History,” in Iver Neumann and Ole Waver, (eds.),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sters in the Making*, p.98.

Swaine, Michael, 2004, “Trouble in Taiwan,” *Foreign Affairs*, Vol. 83, No. 2, pp. 39-49.

Shambaugh, David, 2005,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3, pp. 64-95.

Wendt, Alexander, 1992,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2, pp. 391-392.

Wendt, Alexander, 1995,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0, No. 1, pp. 73-74.